

新住民女性被接受了嗎？多元 文化接受度及其影響因素： 以金門地區為例*

卓正中 高瑞新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對新住民女性多元文化接受度及其影響因素、與新住民間的認知差異，並確認大學生產生偏見、刻板印象及社會距離之原因，從而瞭解學生是否真正接受新住民。本研究以問卷獲得大學生與新住民研究資料，第一次問卷針對大學生抽樣調查 400 人及新住民 269 人。研究發現，大學生對新住民整體刻板印象與偏見較正面，對新住民社會距離不大及多元文化接受度很高，惟對不同國籍的認知明顯有差異；且大學生與新住民除偏見外，兩者對其他變項的認知均存在顯著差異。為確認大學生最願意（或最不願意）通婚國籍原因、印象與偏見因素，本研究再實施第二次問卷。研究發現，大學生最願意通婚國籍為日韓與美澳歐，以生活水平較高為共同因素。在日韓籍中另以「生活及文化面向」為主因，美澳歐籍以「外表及教育程度」為主要考量。大學生最不願意通婚國籍為東南亞與大陸，東南亞籍以生活習性較不同、文化上較不同、生活水平較低為主因。大陸籍以政治意識、無法為我或家人帶來好處、彼此國家（兩岸、區域）間關係不佳為主要理由。第一次問卷發現了大學生對研究變項的認知情形及其與新住民的認知差距；第二次問卷確認了大學生最願意（或最不願意）通婚國籍之原因、印象與偏見因素。

關鍵詞：新住民、多元文化接受程度、社會距離、接觸經驗

* 通訊作者：高瑞新，toptop074@yahoo.com.tw。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是外籍移工與婚姻移民的輸入大國，截至民國 110 年 1 月，臺灣婚姻移民達到 567,143 人，與原住民人數相近（573,086 人），占總人口數約 2.39%；其中以大陸、港澳籍配偶 370,068 人占 65.25% 居首，越南籍 109,861 人占 19.60% 次之（內政部移民署，2021）。在民國 70 年代，婚姻移民者幾乎全是女性，他們通常被認為來自貧困家庭，未受過高等教育，與其結婚的臺灣男子被認為大多處於婚姻弱勢的一群，「更甚者，許多外籍配偶是以近似商品交易的形式，經由婚姻仲介市場進入臺灣的中下階級家庭。她們成為父權與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蔡明璋，2011）。」因此他們的婚姻往往被簡化為「買賣婚姻」（夏曉鵬，2001），並在華人父權的思維下，非但沒有尊嚴更飽受歧視。

以華人社會父系傳統而言，娶媳婦對家庭制度的衝擊比嫁女兒明顯。父母對兒子娶外籍女性（含大陸籍，下同）的態度不僅代表家族的接受度，更反映社會所可能持有的看法，也透露外籍女性入門後所須面臨的環境適應（伊慶春、章英華，2006）。因此，剖析此一面向及其可能之影響因素，將有助於預測未來婚配趨勢，更能就協助婚姻移民女性融入臺灣社會的移民輔導策略提供指引（伊慶春、章英華，2006）。

然而，臺灣社會迎接這群新住民、新文化的方式是鮮花與擁抱，還是充斥著金錢婚姻的偏見和歧視呢？某些報導甚或研究顯示，它是一種偏見與歧視。例如，2010 年前的媒體，尚充斥著對新住民女性「假結婚真賣淫」的負面報導，並高唱新住民子女會「素質低」及「發展遲緩」，此為國人無知的表現，也不排除經媒體報導，加深了民眾對新住民女性的偏見或刻板印象，進而影響了臺灣人民的行動意向，使族群間產生社會距離，進而形成了分歧的多元文化認知（金藝花等人，2018）。因此，如果這些新住民及其子女不能在社會享有公平待遇，我們憑什麼說臺灣社會是文明的？是多元文化的社會呢？經過了二三十年，婚姻移民是金錢移民的刻板印象與偏見還存在嗎？此為本研究所欲探究的主要動機。

陳志柔與吳家裕（2017）曾調查臺灣民眾對婚姻移民女性之態度，研究顯示了臺灣民眾對新住民女性的接納態度提升了，其中社會接觸與價值觀念扮演了很大的推進力量。然而，這是否就表示臺灣民眾不再對新住民女性有刻板印象與偏見嗎？彼此的社會距離就縮短了嗎？臺灣民眾對他們的多元文化接納度就高了？這些問題實值得吾人探究。因為許多研究顯示了不同的發現，例如，金藝花等人（2018）針對大學生的研究，雖發現受訪者對新住民女性有較高正向刻板印象，但是存在著國籍別的重大差異，如對日本、韓國籍者評價甚高，但對東南亞、大陸籍的評價較低，且達顯著差異。再者，龔宜君（2019）在其〈格格不入：來臺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雙重缺場〉研究中發現：「語言實踐的困難、商品化婚姻的符號暴力、負面跨國處境，形塑了越南女性的孤單、親密不滿、受到不禮貌注視、背叛等受苦經驗。」前述不同研究發現的差異性，顯示了國人對移民女性是否真正接納的態度，值得吾人再深入探究。此外，前述民眾對移民女性態度之研究發現是否與新住民本身的認知有差距，亦值得深入研析。例如，高瑞新（2018）之研究發現，兩者間在研究變項上的認知皆存在著顯著差距。造成前述差距的因素，即為本研究欲延伸探究的核心議題。研究者基於前述研究發現的分歧，思索著某一種可能性的存在與否？即在教育程度、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及人際互動增加下，民眾是否反而陷入一種「隱性歧視」而不自知？亦即臺灣民眾是否可能潛藏著一種不露聲色且不自覺歧視的「隱性冒犯」（micro aggressions）呢？其有如厭惡種族主義所展現的是一種潛在的、無意的、消極的種族主義情緒，但持有者卻認為自己是一個講求平等主義和非偏見之人（Dovidio et al., 2002）。

基於上述，若干研究發現的不一致，激發研究者想要進一步探究民眾對新住民女性的態度究竟如何？是否存在著偏見、刻板印象及社會距離上的認知差距？以及民眾與新住民兩者間若存在差距，其原因又為何的新視角研究觀點。雖然學術界對新住民議題的研究不少，但多以其本身或子女為研究對象，研究議題聚焦於生活適應、溝通、人權及子女教育等問題。近來雖有針對臺灣民眾對新住民女性之態度是否改變的縱貫性研究，但仍缺乏針對即將成為社會骨幹之大學生關於婚姻移民的認知調查。選擇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主因在於了解政府多年來推動國人正確認識新住民，特別是對新住民多元文化接納度之成效。因此，在政府長年推動多元文化教育下，這些再 1—3 年內即將成為社會新鮮人的年輕人，是如何看待新住民女性的研究便顯得重要且具有意義性。

綜上，本研究試圖在金藝花等人（2018）及高瑞新（2018）之研究發現的基礎上，以更嚴謹之

研究方法，如增加「家庭收入與居住區域特性之人口統計變項、進行深度訪談與第二次問卷蒐集」之方式，再深入地探討大學生對女性婚姻移民者的態度、社會距離、多元文化接受度，研究變項間的關係，以及新住民是否認為臺灣民眾對他們有偏見、負面的刻板印象及較高的社會距離？同時進一步了解彼此間的認知差異，並確認其差異原因所在，以提供有益於新住民的建言，並解決目前之研究缺口。

（二）文獻探討與假設發展

1. 臺灣婚姻移民脈絡

「婚姻移民」指婚姻之存在係以不同國家、不同人種間所結合之婚姻，其已超越了國界及人種。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婚姻移民擺脫了以往政治性因素，轉向以文化、經濟因素為大宗（Friedman, 2010）。

新住民（new immigrants）是 2016 年來政府對婚姻移民者的正式稱呼，新住民泛指由一個國家移民到另一個國家的人。也因環境因素新住民謀生技能差，造成經濟弱勢，又因氣候、文化及語言等因素適應能力不及在地人；因此，新住民的社會階層較低下（劉家好，2018）。近三十年來，臺灣跨國通婚普及，臺灣在經濟和發展上比起之前的大陸及現今大多的東南亞諸國相對快速，形成貧富差距。貧窮地區人民嚮往富裕地區，為求改善生活而以婚姻遷移方式來到臺灣。所以新住民一般來自相對發展落後，且生活貧困的地區（Lin, 2016）。

有關臺灣跨國婚姻的發展，早期，可能因為留學、移民或工作因素而形成。1970 年代晚期至 1980 年代初期，少數華僑為退伍老兵媒介擇偶對象。1980 年代中期，臺商陸續至中國大陸及東南亞投資後，越來越多處於婚姻市場邊緣的未婚男性基於傳宗接代考量而迎娶外籍配偶；當時，以泰國和菲律賓外籍女性配偶人數最多（葉肅科，2004）。靠婚姻遷徙來尋求經濟保障的故事重複上演著；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蔓延與投資政策的推波助瀾、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與旅遊，以及臺灣在 1994 年推動「南向經濟政策」後，這條跨越國界的千里姻緣線不斷的在臺灣擴張，也造成迎娶大陸與東南亞女性外籍配偶的跨國婚姻現象大量增加（劉家好，2018）。

對於大多數臺灣移民家庭來說，他們的婚姻通常是透過婚姻介紹所促成的。這些快速跨國婚姻的特點往往是伴侶不認識、彼此年齡相差大、語言不同、文化和背景相異，社會經濟地位低，婚姻目標不同（如丈夫想要傳宗接代，妻子想為她的原生家庭提供財務支持），因此夫妻缺乏情感基礎（Lien et al., 2021）。這類婚姻中的夫妻通常表現出互動不足，缺乏凝聚力、親密感及可靠性。許多移民女性經歷詆毀、批評，甚至遭遇丈夫的口頭或身體上的攻擊（Lan, 2019）。除了夫妻關係不佳外，尚須面臨子女教養、語言障礙、文化差異、人際關係及社會的不友善甚至歧視（陳孟筵等人，2020；Chen & Gay, 2020）。基於此，大多數的新住民在臺灣是屬於相對弱勢的一群。

依據移民署 2020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臺灣的新住民主要來自中國大陸、港澳，及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國家，共占 94.7%。上述新住民在臺灣的遭遇，正是來自這些國家婚姻移民者的多數人寫照，也是本文中主要的研究對象（內政部移民署，2021）。

2. 社會距離

社會距離可被視為我們對其他人的愛慕（attachment）或親密程度（McKerrell, 2015），同時也是一種在社會關係中感受到他人對自己的接受程度（Kim et al., 2016）。Bogardus（1925）指稱的社會距離概念，為個體與他人遠離的或親密的感受程度（Simkus, 2016）。從實質上來看，族群社會距離的遠近，可視為族群歧視的一種微妙形式（McKerrell, 2015），蘊含著族群關係的親疏，疏遠的族群關係甚至帶有偏見、敵意和排擠的意味（Goff et al., 2008）。當個人認為群體成員與他們的實際差異更大而避免與群體成員互動時，個人與不同社群間的社會距離就增加了（Damigella & Licciardello, 2014）。當本國人對新移民的社交距離是很大時，通常伴隨著不信任、保留和憂慮的感覺；相反的，當社交距離是最小的，彼此間將有一種共同身份的感覺（Ebner & Helbling, 2016）。基此，社會距離可定義為在特定社會狀況下，可被預期的合作行為度，能進一步視為存在個人間、

群體間，還有個人與他所屬群體間的同情理解度。

研究指出，群體間對資源的競爭可能會加劇偏見進而影響他們之間的社會距離（Choi et al., 2017）。例如，當個人擔心不同群體的成員與他們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工作時，社會距離就加大了，偏見的看法也就更強化了（Schneider, 2007）。既有的研究已顯示社會距離會影響人們關於評估他人行為的公平性（Chen et al., 2017）。社會距離測量之研究也被描述為現代種族主義（modern racism）（Hagendoorn, 1993）；其中之一的展現形式是避免與外團體的接觸，稱之為「厭惡種族主義（aversive racism）」（Dovidio & Gaertner, 1986）。因此社會距離是探討新住民族群如何被本土人士看待的一項指標，也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議題，如 Evans 與 Need（2002）及 Xue（2017）之研究，均以社會距離作為檢視新住民是否被移入國民眾認同的重要指標。

社會距離在族群關係的研究上應用相當廣泛，且往往以通婚來檢視，如 Pagnini 與 Morgan（1990）從歷史上不同族群間的通婚對象切入，以說明族群間的親近性或接受度，亦即不同種族間的社會距離。社會距離主要的影響因素有刻板印象、偏見及接觸經驗。Ebner 與 Helbling（2016）之研究發現，在移民到瑞士的不同種族中可以觀察到最大的社會距離來自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因為他們與瑞士既沒有相同的文化，也沒有相同的語言及教育系統。「在美國，特別是種族關係是一種固定和習俗的社會距離，它確保黑人在他自己的地位上安分守己，只要他安分地待在他的地位，保持他的距離，就可創造一種上下層間的溫和氣氛」（Coser, 1971）。這句話包括態度的三面向，即認知上的刻板印象，意識上的偏見和行為上的歧視。

3. 刻板印象、偏見與接觸經驗對新住民社會距離之影響

Park（1950）認為，偏見似乎或多或少是一種本能的、自發地保持社會距離的傾向（Goldschmidt & Rydgren, 2018）。人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要根據他在已經建立事物的秩序中確定地位，並予以分類和評價（Coser, 1971），進而形成社會距離。因此，偏見涉及對某個特定群體成員的社會評價，是一種基於對某特定群體的信念和行為預想（Nosek et al., 2007）。偏見的程度會因經濟地位、性別和教育水平等個人特徵而異（Smith et al., 2014）。在行為方面對某特定群體成員抱持偏見的人，將會彰顯對他們的親密程度，或對這特定群體成員表現出可容忍的社會距離；而且，偏見與社會距離是相互關聯的（Hebl et al., 2012）。抱持對不同種族的偏見者，與他們的社會排斥有關，其也導致許多複雜的社會問題（Choi et al., 2017）。例如，在美國對黑人持有偏見的人認為大多數罪犯是非洲裔美國人，並影響到非裔美國人在刑事審判方面受到明顯的差別待遇（Kahn & Davies, 2011）。

刻板印象是一種對某些特定群體或許多群體賦予特定的屬性、標籤或汙名（stigma）（Lubis & Buana, 2020）。族群間的誤解部分是由於人們以一種刻板印象和偏見的形式去差異化他們對不同族群的認知和行為（Guyll et al., 2010）。Hagendoorn 與 Kleinpenning（1991）在其研究中提出，在不同情境下對於少數族群刻板印象也會不同，並會影響到人們對少數族群的社會距離。此外，研究亦顯示，某些國家的少數民族經常面對細微的侮辱，雖然這些侮辱是冒犯性的，但往往是無意的（Boysen, 2012）。大多研究發現，不管用什麼方式測量對某群體或其成員的刻板印象，其結果與偏見都有關聯性（Schneider, 2007）。綜前，刻板印象與偏見是相互影響的。如 Gordijn 等人（2001）研究發現，偏見程度愈大的人，負面刻板印象愈高，反之亦然。因此，刻板印象、偏見與社會距離有著緊密不可分割的關係，且可相互作為測量指標。

再者，接觸是否真的有助於拉近社會距離，大多研究是肯定的。如 Dovidio 等人（2005）、Powers 與 Ellison（1995）之研究發現，在適當情形下，兩個敵對團體間的成員，可藉由頻繁的人際接觸而降低對該團體的負面反感，破除原有成見。又 Hwang（2012）之研究發現，較常接觸到新住民者，其對新住民家庭的社會距離感較小。其研究並顯示，社會距離會受到刻板印象、偏見及接觸經驗之影響。此外，偏見也可透過有偏見的個人和群體成員間的互動減輕（Stolle & Harell, 2013），足見不同族群間透過互動而增加接觸經驗的重要性。相同的，國內也有類似的研究發現，如伊慶春與章英華（2006）之研究指出，當進一步檢視社會接觸的效果，發現與新住民的「實質接觸」明顯有助於對婚姻移民的親近性，並會降低社會距離的感覺。又陳志柔與吳家裕（2017）之研究發現，農漁村新住民女性增多，社會接觸也增多，此接觸機制可能增強了鄉村居民對大陸及東南亞女性配偶的接受程度。

整體而言，刻板印象是對特定的社會團體及其成員所持有的認知信念，而偏見是一種抱持的負面態度。前者為認知上的態度，後者為情感上的負向態度，且往往彼此相連（Xue, 2017）。此外，人際接觸被認為是消除意見、化解分歧，進而拉近社會距離的關鍵，也被稱為「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Gaertner et al., 1996）。其包含直接與間接、虛擬接觸（網絡）、暫時或持久等多種不同方式（Crisp & Turner, 2012）。

綜上，本研究推斷以下兩點：首先，刻板印象、偏見及接觸經驗對社會距離可能有影響。再者，直接、間接及其久暫對社會距離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₁：刻板印象、偏見與接觸經驗對新住民社會距離之認知有顯著影響。

H_{1.1}：刻板印象對新住民社會距離之認知有顯著影響。

H_{1.2}：偏見對新住民社會距離之認知有顯著影響。

H_{1.3}：不同接觸經驗對新住民社會距離之認知有顯著影響。

4. 多元文化接受程度

從學理上講，所謂「多元文化」是指在交往中參與者不只依賴自己的代碼、習慣、觀念和行為方式，也同時經歷和了解對方的代碼、習慣、觀念和行為方式的所有關係（Gollnick & Chinn, 1994）。「多元文化」是在全球化中，社會流動性增加和種族混雜造成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的本質是改變傳統和現存的文化，是一種新文化的創造（金藝花等人，2018；高瑞新，2018）。此外，「多元文化」可理解為具有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群體間的相互作用（Modood, 2017）。有關「多元文化接受程度」之定義，Cho 與 Sok（2019）認為其係指從多元文化的態度中理解其他文化並接納其他文化的能力稱之為「多元文化接受程度」。Kim（2010）在其研究中指出，多元文化接受程度是多元文化社會的成員必備的適應能力之一，並認為多元文化接受程度包括三個因素：即認同文化差異且沒有偏見的認知因素、在不熟悉的、與「我」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保持積極態度，能夠移情思考的情感因素和能夠適當進行互動的行為因素（高瑞新，2018）。基於此，多元文化接受程度可作為一種理解多元文化、接受多元文化、並與不同文化的人共存的價值取向（Kim, 2013）。因此如何接受「多元文化」是一種態度，包括情感、認知和在此基礎上的行為意向（金藝花等人，2018）。

多元文化接受度其實際用語是多樣化的，如跨文化適應性（Kelley & Meyers, 1995）、跨文化交際能力（Jeong & Jeong, 2012）及跨文化敏感度等。然而，從許多學者之研究可知（例，高永晨，2014；Jeong & Jeong, 2012），研究者在實際運作中不管使用那一種用語，都涵蓋認知、情感及行為意向的三項態度因素。基此，吾人可把「多元文化接受度」界定為一種態度，是對於與「我」文化有差異或衝突的文化現象、風俗、習慣等有充分正確的認識，並在此基礎上予以接受與適應（Ahn, 2007）。

綜上，多元文化接受度之概念界定，本研究將以多元文化認知，情感方面的多元文化開放性和移情能力，行動意向方面的多元文化交際能力三構面，做為多元文化接受度的衡量指標。

5. 刻板印象、偏見、不同接觸經驗與社會距離對新住民多元文化接受度影響

有關多元文化接受度之影響因素很多，高永晨（2014）在跨文化交際能力研究中，以社會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專業、外語程度）、出國經歷、接觸經驗作為研究變項，其研究發現，中國大學生總體跨文化交際能力處於比較理想狀態，且不同背景大學生在跨文化交際能力上有顯著差異。性別方面，女生在各面向上高於男生。不同出國經歷方面，有出國經歷的學生比未出國者更有優勢。跨文化接觸經驗方面，有跨文化接觸經驗的學生在各面向上均勝過沒有者。前述文獻說明了接觸經驗，對學生或民眾多元文化接受度的影響。此外，Chung（2014）在其研究中，以社會人口變項（性別、年級、有無多元文化朋友）、接觸經驗、社會距離為變數，獲致刻板印象，偏見會影響社會距離，進而影響青少年多元文化接受度之研究結論，以及有多元文化朋友的青少年，其多元文化接受度高於無者。至於接觸經驗方面，無論是形式上的（學校課程規定之多元文化教育），還是非形式上的（社區活動，媒體接觸……等），都會影響青少年的多元文化接受度。另外，Park 與 Lee（2013）之研究顯示，影響多元文化接受度的要因社會距離，其社會距離感越低多元文化接受

程度愈高。而 Kim 與 Ahn (2014) 之研究指出，男女大學生對東南亞籍移工的刻板印象和偏見是影響其多元文化接受度的主因。Lubis 與 Buana (2020) 之研究指出，不同族群間出現刻板印象和偏見，會破壞不同文化間的理解，並為交流和互動製造障礙；刻板印象和偏見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從經常與之互動的人、個人經驗和大眾媒體中習得的。

綜上，基於文獻回顧可推斷，背景變項、刻板印象、偏見、接觸經驗與社會距離對多元文化接受度均有影響性。基此，提出以下假設：

- H₂：刻板印象、偏見與接觸經驗對新住民多元文化接受度之認知有顯著影響。
- H_{2,1}：刻板印象對新住民多元文化接受度之認知有顯著影響。
- H_{2,2}：偏見對新住民多元文化接受度之認知有顯著影響。
- H_{2,3}：不同接觸經驗對新住民多元文化接受度之認知有顯著影響。
- H₃：社會距離對新住民多元文化接受度之認知有顯著影響。

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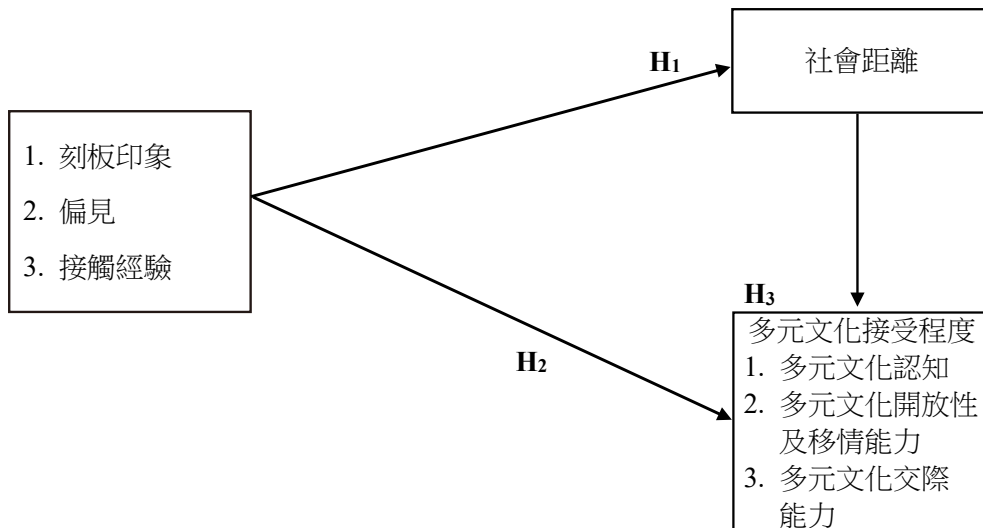
(一) 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論述和假設，本研究架構主要包含：(1) 刻板印象、偏見、接觸經驗對社會距離之影響；(2) 刻板印象、偏見、接觸經驗對多元文化接受度之影響；(3) 社會距離對多元文化接受度之影響。基於前述，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二) 分析策略

本研究首先以次數分配瞭解樣本的分布情形，以及變數的平均值和問項得分，並進行 Pearson 相關分析和信度分析，以瞭解這些變數間的相關及其 Cronbach's α 係數。之後，本研究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檢驗研究變項的效度。此外，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討論變項間的關係，並確定受訪者和在金門定居之新住民於研究變項間是否存在差異？最後，為了避免共同方法變異 (common method variance) 的問題發生，在分析資料前本研究採用了 Podsakoff 與 Organ (1986) 提出的「Harman's 單因子事後分析法」確定本研究問卷是否存在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 (Chen & Kao, 2012)。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單一因子解釋的最大變異量僅 19.56%，顯示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

圖 1
本研究模式圖



(三) 問卷實施過程

1. 第一次問卷發放

本研究對象是大學生和新住民（以女性配偶為主），為了增加抽樣區域的代表性，本文選擇了金門大學學生作為抽樣母體，金大學生 90% 以上來自臺灣各地，受訪者來校之前所住的地點較能涵蓋全臺各區域，並且為能真實反映臺灣之大學生對新住民女性關於本研究變項的認知，問卷發放的對象亦著重各區域的比例（問卷將居住區域分為六都、一般縣市、離島地區）。前述作法，雖然不能因此就謂本研究樣本具有全國代表性，惟在研究時間與對象之限制性下，較能兼顧研究的嚴謹性。金大大學部學生共約 4,000 名，基於既有文獻建議（例，Krejcie & Morgan, 1970），本研究將抽樣 1 / 10 的學生，即 400 人。

基於，本研究選擇金大日間部與進修部兩個主要學生群體作為研究樣本，他們分別於 2017 年至 2020 年入學，以增加問卷調查對象的異質性，並減少共同方法變異的可能性（Chen & Kao, 2012）。在抽樣方法方面，本研究採用了定額便利抽樣法。由於日間部與進修部的比例為 4.25 : 1，本研究因此對日間部學生進行抽樣調查 324 人，其中男性 142 人、女性 182 人；至於進修部 84 人，其中男性 43 人、女性 31 人，受訪者共計 400 人。

另外，根據移民署 2020 年 12 月統計資料，金門縣新住民人口有 2,798 人，其中大陸籍（含港澳）有 2,458 人（男：111、女：2,347），外籍 340 人（男：13、女：327）（內政部移民署，2021）。金門縣新住民人口以大陸籍最多占 87.85%，大陸（含港澳）地區比率居全國第二；外籍新住民部分主要為越南籍 182 人及印尼籍 117 人，其他國籍 41 人，包含泰國、菲律賓、日本、韓國、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等地（內政部移民署，2021）。基於本研究在抽樣大學生 1 / 10 的狀況下，亦針對居住在金門縣的新住民抽樣 1 / 10，並依移民署公告之大陸籍與各國籍人數比例分配，共計抽樣 270 人；其中男性 7 人、女性 263 人。總計大學生回收有效問卷 388 份，其中日間部 316 份，進修部 72 份；新住民回收有效問卷 192 份。有關新住民問卷，基於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大學生的多元文化接受度及其影響因素，因此僅作為與大學生在刻板印象、偏見、社會距離與多元文化接受度認知上的差異性分析。

2. 第二次問卷發放

本研究在進行第一次問卷並加以分析後，發現受訪之大學生對其是否願意自己或家人與外籍人士通婚的選項中，國籍有明顯差異性。例如最喜歡通婚之對象為日韓、次為美澳歐，而且對他們抱持較正面刻板印象（如有能力、有才幹的）與正向偏見（如文化素質高）；反之，對東南亞及大陸籍通婚之意願是最低及次低，而且對他們抱持較負面刻板印象（如貧困的）與偏見（如經濟婚姻），詳細統計分析資料將於後文中敘明。前述現象讓研究者試圖再深入探究其中的真正原因，因而本研究先透過原受訪者進行訪談（日間部抽取 4 位，進修部抽取 2 位），針對願意（或不願意）自己或家人與某一國籍人士通婚的原因、印象與偏見進行深度訪談。受訪者人數以資料飽和度（data saturation）原則作為結束訪談的參考標準。所謂資料飽和度意即，當已經無法從後來的受訪者中萃取出新的或不同的觀點時，即可停止訪談與觀察（Fusch & Ness, 2015）。資料飽和度不是資料本身的數字，而是有關資料的深度，大樣本不一定可以達到資料飽和（Burmeister & Aitken, 2012）。資料是否已達飽和由研究者自行判斷，並決定是否中止訪談。基於前述原則，本研究共訪談 6 人，訪談逐字稿繕打後，針對訪談稿的描述與解釋，學者建議可採用紮根理論進行分析（萬文隆，2004）。本研究藉此透過開放性編碼及主軸編碼進而萃取出願意（或不願意）自己或家人與某一國籍人士通婚的原因、印象與偏見之構成因素，並藉此編撰第二次問卷。

第二次問卷受訪對象不包含新住民僅針對金大原受訪之學生，問卷所得統計資料僅做為分析受訪者對其最願意（或最不願意）通婚國籍之原因、印象與偏見因素，以達欲確認臺灣大學生與新住民在研究變項上認知差異的原因之研究目的。在第一次問卷施測大約一個月後，本研究對原受訪者進行第二次問卷施測。基於第一次問卷之抽樣方式與比例，有關抽樣調查之人數、性別及日間與進修部之人數均與第一次相同，惟回收人數、性別與學制比例不同。總計第二次問卷之大學生回收有效問卷 369 份，其中日間部 308 份，進修部 61 份。

(四) 問卷衡量

本研究變項衡量採用李克特 5 點尺度量表，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和「非常同意」。此外，研究中變項得分代表受訪者的刻板印象、偏見、接觸經驗，他們對社會距離的認知程度以及他們的多元文化接受度。各變項得分越高者，表示受試者對評量項目的認同程度越強。計分方式為整體計分，所有題項皆為正向計分（反向題先轉為正向分數），各題項分數相加後，得分越高者代表受試者認同程度越高。各量表在實施預測後，均以項目分析刪除決斷值未達顯著水準之題項，經檢驗本研究各量表題項均達顯著水準。各研究變項衡量說明如下：

1.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量表參考 Corrigan 與 Schmidt (1983) 開發的諮商員評分量表 (counselor rating form, CRF)，並依據 Lee (2007) 及 Lee (2015) 之研究中修改使用的形容詞，以及 Jeon 與 Jun (2010) 之研究量表，從中篩選出「貧困的」、「有能力的、有才幹的」、「做事勤奮的」3 項題幹，其中第 1 題為反向題。同時為考量臺灣新住民特性（如以大陸及東南亞籍為主），每題幹分別對應到 6 個子題項，分別為：東南亞、大陸、港澳、日韓、美澳歐、其他國籍。本量表各構面信度為：貧困的 (Cronbach's $\alpha = .87$)；有能力的、有才幹的 (Cronbach's $\alpha = .96$)，及做事勤奮的 (Cronbach's $\alpha = .86$)。

本量表參酌 Corrigan 與 Schmidt (1983) 以及 Jeon 與 Jun (2010) 之研究量表，乃因 Corrigan 之 CFR 是探討諮商員和當事人之間的互動，以及兩者間不斷變化與進展的關係。CFR 在社會心理學以及諮商心理學中，常用於測量待人認知 (Lee, 2015)。此外，Jeon 與 Jun 之研究對象為大學生，研究議題是大學生對於女性跨國婚姻移民的刻板印象及其對社會距離感之影響，甚符合本研究主軸，且國內尚未發展出針對大學生衡量新住民刻板印象的量表，故參引之。

2. 偏見

偏見作為態度要素之一，係指對特定對象之外貌，行動和生活方式等毫無根據的偏愛或討厭傾向 (Youn, 2011)。Youn (2011) 之研究對象為新住民兒童，旨在衡量偏見是否會影響韓國人對他們的社會距離。此外，本研究參考 Stephan 等人 (1998) 所發展之偏見態度量表，包含「文化素質高」、「經濟婚姻 (反向題)」、「友善的」3 項題幹。本研究參酌 Stephan 等人之研究量表，乃因該研究主要在探討受訪者對新移民的評價或情緒反應的感受程度，與本研究主軸相同。同時為考量臺灣新住民特性，每題幹分別對應到 6 個子題項，子題項與上一研究變項同。本量表各構面信度如下：文化素質高 (Cronbach's $\alpha = .90$)、經濟婚姻 (Cronbach's $\alpha = .94$)、友善的 (Cronbach's $\alpha = .93$)。

3. 接觸經驗

本研究參考金藝花等人 (2018) 之研究量表，將接觸經驗區分為接觸方式與時間。接觸方式分為直接與間接接觸，前者基於透過與家中有新住民的親友之接觸或是藉由出國、遊學而有接觸到跨國文化的機會，將本變項以「親友接觸」、「出國、遊學經驗」2 題項來測量。後者採用「透過媒體 (新聞、網絡) 接觸」、「透過虛擬網絡接觸 (SNS, 遊戲)」2 題項測量；並編排接觸時間 1 題，以月為單位，接觸時間指從有直接或間接接觸經驗開始迄受訪時之期間。本量表各構面信度如下：直接接觸 (Cronbach's $\alpha = .71$)、間接接觸 (Cronbach's $\alpha = .78$)。

4. 社會距離

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及前述文獻探討，依據 Bogardus (1925) 「社會距離量表」之通婚意願 (含自己或家人) 瞭解金大學生對不同原屬國籍之新住民的社會距離。Bogardus 所發展之量表雖然年代較早，惟其研究旨在測量受訪者對美國最常見種族群體成員的看法，從 1920 年至 1977 年間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研究，獲致良好的問卷信效度 (Groyecka et al., 2019)，迄今仍廣泛地運在各項研究

中，如 Parrillo 與 Donoghue (2005)、Wark 與 Galliher (2007)、Geisinger (2010) 及 Groyecka 等人 (2019)。Bogardus 量表背後的基本概念是，個人對特定群體的偏見越大，就越不希望與該群體成員互動 (Groyecka et al., 2019)。因此，構成 Bogardus 量表的項目描述了受訪者可能願意與特定文化群體成員 (例如，配偶、朋友、鄰居、同事、公民、到我們國家的遊客) 建立的關係。受訪者對特定群體的態度或尊重被定義為受訪者願意接受與該群體成員關係的密切程度。Bogardus 的研究促進了社會距離的實證化，為社會距離的量化操作提供了操作性工具，該量表採用客觀的外顯行為測定受試者的原始反應，測量方式上較為客觀 (金藝花等人, 2018)；此為本研究採用此量表的主因。

社會距離的衡量雖然包含其他因素，惟基於本研究之新住民係透過婚姻移民而成為新臺灣人，因此國人是否願意自己或其家人與外籍人士通婚，便成為本研究探討大學生是否與新住民仍有社會距離的觀察起點。吳澤霖 (1992) 利用 Bogardus (1925) 的社會距離量法，研究了美國人在對待東方人、黑人、猶太人的不同態度，發現受試者對於不同族群之社會距離有差異，故在社會距離測量中加入新住民的原屬國籍。基此，本量表題幹為：您願意您或您的家人與下列人士通婚嗎？題幹分別對應到 6 個子題項，子題項與刻板印象同。另因本構面係單一題項故未檢測其信度。

5. 多元文化接受度

為了評估多元文化的接受度，本研究參考金藝花等人 (2018) 的「多元文化接受度」量表，本研究並依據新住民的特徵進行修改，以確保問卷符合研究主題。問卷包含多元文化認知、多元文化開放性及移情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際能力之態度三因素。題項分別為：多元文化認知 6 題 (如，交朋友不應分國籍、種族、民族、信仰)、多元文化開放性 3 題 (如，我希望新住民持續不斷的增加)、多元文化移情能力 3 題 (如，我討厭聽到別人對新住民的負面評論)、及多元文化交際能力 6 題 (如，我願意把新住民朋友介紹給家人)，共計 18 題。本量表各構面信度如下：多元文化認知 (Cronbach's $\alpha = .77$)、多元文化開放性及移情能力 (Cronbach's $\alpha = .79$)、及多元文化交際能力 (Cronbach's $\alpha = .91$)。

6. 控制變數

基於過去研究 (例，陳志柔、吳家裕, 2017; Hainmueller & Hiscox, 2007; Hwang, 2012; Jones & Smith, 2001; Munroe & Pearson, 2006)，本文將受訪者背景變項，如性別、年齡、學制、年級、家庭收入與居住區域納為控制變項，以驗證個人背景變項和研究變項間的關係 (Chen & Kao, 2012)。此外，因性別、學制與居住區域為類別變項，本研究將以 t 檢定或單因子變數分析驗證其在各變項上之差異。而年齡、年級與家庭收入則納入階層迴歸分析模式。

7. 新住民之刻板印象、偏見、社會距離與多元文化接受度之衡量

本部分主要探討新住民對研究變項的認知情形，目的在驗證金大學生與居住在金門之新住民 (研究對象主要為女性配偶) 於各變項上是否有認知上的差異，因此本部份並未進行新住民關於研究變項間的關係檢定。此外，因接觸經驗屬於實際體驗，且受訪者本身即為新住民，故不納入差異性探討項目。量表主要依據金大學生的問卷將原題項內容加以改編，如刻板印象量表，在大學生問卷之第 1 題為：你認為東南亞、大陸、港澳、日韓、美澳歐、及其他國籍之新住民是貧困的嗎？在新住民問卷修改為：你覺得臺灣人會認為東南亞、大陸、港澳、日韓、美澳歐、及其他國籍之新住民是貧困的嗎？其他研究變數題項亦同。本量表各構面信度如下：刻板印象 (Cronbach's $\alpha = .83$)、偏見 (Cronbach's $\alpha = .83$)、接觸經驗 (Cronbach's $\alpha = .68$)、多元文化接受度 (Cronbach's $\alpha = .86$)。另因社會距離構面係單一題項故未檢測其信度。

結果

(一) 基本分析

有關人口統計變項，在性別方面，男性 181 人占 46.6%，女性 207 人占 53.4%。在年齡方面，平均 21.4 歲，最小 18，最大 51。在學制與年級部分，日間部共 316 名 (81.4%)，進修部 72 名 (18.6%)，符合研究母群體之學制比例；年級部分 1 年級共 111 名占 28.6% (其中日間部 86 名，進修部 25 名)，2 年級共 112 名占 28.9% (其中日間部 87 名，進修部 25 名)，3 年級共 104 名占 26.8% (其中日間部 88 名，進修部 16 名)，4 年級共 61 名占 15% (其中日間部 55 名，進修部 6 名)，年級比例大致符合母群體比例。另在居住區域方面，受訪者原居住在六都、一般縣市、離島地區的比例大約為 61%、32%、7%，亦大致符合我國的人口分布比例。新住民部分，在性別，男性 5 人，女性 187 人，符合研究母群體之性別比例；在年齡，平均年齡為 40.38 歲，最小為 23，最大為 67。在金門居住年數平均 11.80 年，收入月平均 1,000 美元。國籍以大陸籍 167 人占 86.98% 最多；越南籍 14 人占 7.29% 次之；印尼籍 6 人占 3.2% 再次之；港澳籍 3 名；日本及韓國各 1 名，其因日本新住民僅 4 人，韓國籍 1 人。新住民受訪者之國籍亦符合研究母群體之比例。

表 1 顯示本研究每一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相關係數與信度係數。由表 1 可知，受訪之大學生對新住民之刻板印象及偏見較為正面；社會距離不大，多元文化接受度是高的。此外，在接觸經驗中有較多之受訪者有新住民之朋友、同事或親戚，但較無出國旅遊或打工的直接接觸經驗；並且有較多之受訪者從媒體 (新聞、報紙等) 或 SNS (如社交網絡服務、社群互動平台、社會性網絡服務) 及網絡遊戲中與新住民有間接之接觸經驗。另外，為了確認觀察變數是否能將潛在變數精確地衡量出來，及檢驗刻板印象、偏見、接觸經驗、社會距離和多元文化接受度是否為不同的因素結構，本研究以 LISREL 最大似法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由表 2 可知，五個研究變項之 χ^2/df 均小於 5，顯示資料與該模式之間具有良好的配適度 (Schumacker & Lomax, 1996)。同時，GFI 均大於 .80，顯示本研究各變項均具有建構效度 (Jöreskog & Sörbom, 1988)。且 NNFI 均大於 .90、PGFI 均大於 .50 及 RMSEA 均小於 .08，亦表示研究變數已具有相當水準之模式配適度 (Bagozzi & Yi, 1989; Baumgartner & Homburg, 1996)。綜合前述各指標，本研究五個變項均具有好建構效度，且為不同研究構念。有關變項間之關係，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探討之。

(二) 研究變項題項分析

1. 第一次問卷分析

(1) 受試者接觸經驗分析。接觸時間，與新住民之接觸時間，以 2 年以上及不到 6 個月者占多數，均為 117 名，各占 30.2%。接觸方法，在直接接觸經驗部分，有新住民配偶、朋友、同事或親戚 (直接接觸 1) 共計 240 名占 61.9%，沒有者共計 148 名占 38.1%；有出國旅遊或打工的經驗 (直接接觸 2) 共計 175 名占 45.1%，沒有者共計 213 名占 54.9%。在間接接觸經驗中，有媒體接觸經驗 (間接接觸 1) 者共計 335 名占 86.3%，沒有媒體接觸經驗者共計 53 名占 13.7%；以 SNS (如社交網絡服務、社群互動平台、社會性網絡服務) 或網絡遊戲方式 (間接接觸 2) 與新住民有接觸經驗者共計 253 名占 65.2%，沒有經驗者共計 135 名占 34.8%。

表 1
敘述性統計、相關與 Cronbach's α 係數表

研究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1. 刻板印象	3.516	.438	.93***						
2. 偏見	3.490	.387	.517***	.89***					

(續下頁)

表 1
敘述性統計、相關與 Cronbach's α 係數表 (續)

3. 直接接觸	接觸	1.465	1.498	.022***	.030***	.71***				
4. 間接接觸	經驗	1.348	.954	.116***	.011***	.328***	.78***			
5. 時間 (月)		12.255	11.330	.038***	.032***	.428***	.379***			
6. 社會距離		3.683	.679	.422***	.339***	.200***	.09***	.114*		
7. 多元文化接受度		4.060	.490	.426***	.307***	.488***	.039***	.900*	.488***	.90

註：n = 388。對角線之數值為各變項之信度值。社會距離與接觸經驗均為單一題項故無信度值。

* $p < .05$. *** $p < .001$.

表 2
研究變項配適度指標表

研究變項	χ^2/df		GFI		NNFI		PGFI		RMSEA	
	觀察值	理想值	觀察值	理想值	觀察值	理想值	觀察值	理想值	觀察值	理想值
刻板印象	3.23		.96		.97		.72		.062	
偏見	3.42		.95		.95		.69		.066	
接觸經驗	4.47	1.00 ~ 5.00	.93	> .80	.93	> .90	.58	> .50	.071	< .08
社會距離	4.59		.93		.92		.52		.076	
多元文化接受度	4.12		.93		.93		.54		.068	

(2) 刻板印象之分析。經由統計結果顯示，刻板印象總量表平均數 3.52。其中受訪者對新住民之刻板印象以「有能力、有才幹的」平均數 3.61 為最高、「做事勤奮的」3.51 次之、「貧困的」3.43 為最低。以新住民原屬國籍來分，受試者對新住民之刻板印象總量表中，日韓籍平均數為 3.74 得分最高、其次依序為美澳歐平均數 3.69，港澳籍 3.62，東南亞籍 3.60，大陸籍 3.54，最低為其他國籍（上述之外）平均數為 3.48。

(3) 偏見之分析。經由統計結果顯示，偏見總量表平均數 3.49。其中受訪者對新住民之偏見以「友善的」平均數 3.57 為最高、「經濟婚姻」3.50 次之、「文化素質高」3.40 為最低。按原屬國籍來分，以日韓籍平均數 3.65 為最高、其次依序為美澳歐洲平均數 3.61，港澳籍平均數 3.48，東南亞籍平均數 3.47，其他國籍（上述之外）平均數為 3.48，大陸籍平均數 3.35 為最低。

(4) 社會距離之分析。經由統計結果顯示，社會距離總量表平均數為 3.68，其中與日、韓籍通婚意願平均數 3.86 為最高，表示社會距離感最小；美、澳、歐籍 3.83 次之；東南亞及大陸籍通婚意願為 3.53 及 3.57 為最低及次低，表示受訪者對於東南亞籍之新住民社會距離最大。

(5) 多元文化接納程度之分析。經由統計結果顯示，多元文化接納程度總量表平均值為 4.06，以認知層面平均數 4.36 為最高，交際能力 4.13 次之，情感層面 3.69 最低。

2. 第二次問卷分析

為了解受訪者是否願意自己或家人與新住民通婚或不通婚之原因，以及對新住民之印象及看法（或偏見），本研究進行第二次問卷分析。由表 3 之統計分析可知，在受訪者最願意通婚的選項中，以生活水平較高、生活習性較相近、文化上較貼近為最主要之三大原因。在受試者最願意通婚之前兩國籍的日韓與美澳歐中，以生活水平較高為兩者之共同因素。另在日韓籍中可看出，以生活及文化面向作為選取之理由，美澳歐籍則另以外表及教育程度為主要考量。

此外，在受訪者最不願意通婚的選項中，由表 4 分析可知，以生活習性較不同、文化上較不同、生活水平較低為最主要之三大原因。以受訪者最不願意通婚之東南亞與大陸籍觀之，前述三大原因

為受訪者對東南亞國籍最不願意通婚之三大理由，但在大陸籍方面則以政治意識、無法為我或家人帶來好處、彼此國家（兩岸、區域）間之關係不佳為最不願意通婚之三大理由。

表 3
最願意與外籍人士通婚的國籍、原因、印象與看法

題目	整體最願意通婚的國籍及其前三項原因	最願意通婚國籍中的前三項原因	
1. 您最願意您或您的家人與下列家人與下列人士通婚的國籍為何？（6 選項）	1. 日、韓（40.9%） 2. 美、澳、歐（22.7%）	日、韓	美、澳、歐
2. 您最願意您或您的家人通婚的國籍之原因為何？（11 選項）	1. 生活水平較高（23.5%） 2. 生活習性較相近（18.2%） 3. 文化上較貼近（17.4%）	1. 生活水平較高（35.2%） 2. 生活習性較相近（22.4%） 3. 文化上較貼近（22.2%）	1. 生活水平較高（41.4%） 2. 外表較好（24.1%） 3. 教育程度高（13.8%）
3. 您最願意您或您的家人通婚的國籍中您對她（他）們的印象為何？（11 選項）	1. 做事勤奮的（22.0%） 2. 素質高（20.5%） 3. 有能力、有才幹（15.9%）	1. 做事勤奮的（33.3%） 2. 素質高（27.8%） 3. 有能力、有才幹（13.0%）	1. 富裕的（27.6%） 2. 素質高（24.1%） 3. 有能力、有才幹（20.7%）
4. 您最願意您或您的家人通婚的國籍中您對她（他）們的看法如何？（7 選項）	1. 文化涵養高（37.1%） 2. 友善的（22.7%） 3. 經濟狀況佳（19.7%）	1. 文化涵養高（51.9%） 2. 友善的（18.5%） 3. 經濟狀況佳（16.7%）	1. 文化涵養高（41.4%） 2. 經濟狀況佳（31.0%） 3. 可生出較好的下一代（10.3%）

註：n = 369。

表 4
最不願意與外籍人士通婚的國籍、原因、印象與看法

題目	整體最不願意通婚的國籍及其前三項原因	最不願意通婚國籍中的前三項原因	
1. 您最不願意您或您的家人與下列人士通婚的國籍為何？（6 選項）	1. 東南亞（40.2%） 2. 大陸（21.2%）	東南亞	大陸
2. 您最不願意您或您的家人通婚的國籍之原因為何？（11 選項）	1. 生活習性較不同（18.9%） 2. 文化上較不同（14.4%） 3. 生活水平較低（13.6%）	1. 生活習性較不同（28.3%） 2. 生活水平較低（18.9%） 3. 文化上較不同（17.0%）	1. 政治意識（15.6%） 2. 無法為我或家人帶來好處（12.5%） 3. 彼此國家（兩岸、區域）間之關係不佳（12.5%）
3. 您最不願意您或您的家人通婚的國籍中您對她（他）們的印象為何？（11 選項）	1. 素質低（24.2%） 2. 貧困的（15.9%） 3. 無家庭責任（12.1%）	1. 貧困的（24.2%） 2. 素質低（15.9%） 3. 做事不勤奮的（12.1%）	1. 素質低（46.9%） 2. 無家庭責任（9.4%） 3. 做事不勤奮的（9.4%）
4. 您最不願意您或您的家人通婚的國籍中您對她（他）們的看法如何？（7 選項）	1. 文化涵養低（22.0%） 2. 經濟婚姻（21.2%） 3. 不友善的（14.4%）	1. 經濟婚姻（34.0%） 2. 文化涵養低（32.1%） 3. 教育程度低（17.0%）	1. 文化涵養低（34.4%） 2. 不友善的（25.0%） 3. 經濟婚姻（12.5%）

註：n = 369。

(三) 本研究變項在性別、學制與居住區域上之差異分析

1. 性別

經由 t 檢定分析，由表 5 可知，不同性別受試者對新住民刻板印象、偏見、及社會距離並未達顯著差異；但對直接接觸達顯著差異 ($t = 1.98, p < .05$)，且男性平均分數高於女性；對間接接觸達顯著差異 ($t = -3.03, p < .05$)，且女性平均分數高於男性。此外，多元文化接受度達顯著性差異 ($t = -3.61, p < .001$)，且其子構面多元文化認知 ($t = -3.56, p < .001$)、多元文化開放性及移情能力 ($t = -2.31, p < .05$)、多元文化交際能力 ($t = -3.35, p < .01$) 均達顯著性差異，且女性在各構面平均分數均高於男性。

表 5
性別與學制 t 檢定指標

研究變項	性別	學制	研究變項	性別	學制
刻板印象	-.35**	.100	多元文化接受度	-3.61***	1.08**
偏見	.79**	.240	多元文化認知	-3.56***	.58**
社會距離	-.95**	-.220	多元文化開放性及移情能力	-2.31*	3.45**
接觸 經驗	直接 接觸	1.981*	多元文化交際能力	-3.35**	-.44**
	間接 接觸	-3.034*			
時間 (月)	.770*	-.231			

註： $n = 388$ 。

* $p < .05$. ** $p < .01$. *** $p < .001$.

2. 學制

由表 5 可知，不同學制受試者在刻板印象、偏見、接觸經驗各構面、社會距離、及多元文化接受度整體構面並未達顯著性差異；但對多元文化接受度之開放性及移情能力子構面達顯著性差異 ($t = 3.45, p < .01$)；且日間部受試者平均分數高於進修部。

基上，不同學制在本研究變項整體構面均未達顯著差異，本研究因此將日間與進修部學生問卷合併進行檢驗各變項間之關係。

3. 居住區域

為瞭解受試者的居住區域對於本研究變項之看法是否存在差異性，本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並以 Scheffe's 事後分析法檢測兩者間的差異，分析結果如表 6 所示。表 6 顯示受試者的居住區域除間接接觸之研究變項有顯著差異外，其餘變項皆無；並經由 Scheffe's 法檢測後發現，原居住六都之受試者與原離島居住者間的差異性達顯著水準。顯示，居住區域會影響受訪者透過媒體（新聞、網絡）接觸、透過虛擬網絡接觸（SNS，遊戲）之接觸經驗，其差異性特別彰顯在原居住六都與離島受試者兩群組間。

(四) 階層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階層迴歸進行變項關係間的檢驗，分析結果如表 7 與 8 所示。此外，為確保共線性問題不致於影響分析結果，在分析前本研究先從迴歸分析模式中確認各研究變數之 VIF 值均明顯小於 10（介於 1.018—1.559）（如表 7 所示），顯示本研究各迴歸模式並未存在共線性問題。

為探討大學生的刻板印象、偏見、接觸經驗、社會距離對多元文化接受度及其子構面的影響，

本研究進行階層迴歸分析。表 7 模式 1 與 3 分別為控制變項（年齡、年級、家庭收入）對社會距離及多元文化接受度的迴歸分析。由模式 1 與 3 可知，控制變項對社會距離及多元文化接受度均無顯著影響。在模式 2 中，本研究加入刻板印象、偏見與接觸經驗自變項後，發現刻板印象、偏見與直接接觸經驗對社會距離有顯著影響（ $\beta = .337, p < .001$; $\beta = .163, p < .05$; $\beta = .182, p < .001$ ），但間接接觸經驗無顯著影響（ $\beta = .017, p > .05$ ）。因而 $H_{1,1}$ 及 $H_{1,2}$ 獲得支持，但 $H_{1,3}$ 僅部分獲得支持。在模式 4 中，本研究加入刻板印象、偏見與接觸經驗自變項後，發現年級對多元文化接受度有顯著負向影響（ $\beta = -.144, p < .05$ ），刻板印象、偏見對多元文化接受度具顯著正向影響（ $\beta = .358, p < .001$; $\beta = .138, p < .05$ ），但直接及間接接觸經驗對多元文化接受度未具顯著影響（ $\beta = .070, p > .05$; $\beta = .023, p > .05$ ）。因而 $H_{2,1}$ 及 $H_{2,2}$ 獲得支持，但 $H_{2,3}$ 未獲支持。此外，在模式 5 中，本研究再加入社會距離自變項後，發現社會距離對多元文化接受度具顯著正向影響（ $\beta = .349, p < .001$ ），因而 H_3 獲得支持。另外，由表 7 模式 6 至 8 可知，刻板印象及社會距離對多元文化接受度之認知（ $\beta = .206, p < .001$; $\beta = .267, p < .001$ ），情感（ $\beta = .259, p < .001$; $\beta = .268, p < .001$ ）及交際（ $\beta = .182, p < .001$; $\beta = .382, p < .001$ ）構面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偏見及接觸經驗對多元文化接受度各子構面均未具顯著影響。

綜上，本研究假設除接觸經驗對社會距離部分獲得支持（僅直接經驗獲支持）、及接觸經驗對多元文化接受度未獲支持外，其餘假設均獲支持。

表 6
居住區域之變異數分析

	變數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刻板總	群組間	.397	2	.199	1.036	.356
	群組內	73.798	385	.192		
	總計	74.196	387			
偏見總	群組間	.064	2	.032	.213	.808
	群組內	57.957	385	.151		
	總計	58.021	387			
社會距離	群組間	1.857	2	.928	2.022	.134
	群組內	176.729	385	.459		
	總計	178.586	387			
直接接觸	群組間	8.059	2	4.029	1.803	.166
	群組內	860.426	385	2.235		
	總計	868.485	387			
間接接觸	群組間	6.754	2	3.377	3.765	.024
	群組內	345.359	385	.897		
	總計	352.113	387			
多元總	群組間	.028	2	.014	.058	.944
	群組內	92.999	385	.242		
	總計	93.027	387			
多元認知	群組間	.024	2	.012	.040	.961
	群組內	115.018	385	.299		
	總計	115.042	387			
多元情感	群組間	.396	2	.198	.709	.493
	群組內	107.677	385	.280		
	總計	108.073	387			
多元交際	群組間	1.020	2	.510	1.279	.280
	群組內	153.616	385	.399		
	總計	154.637	387			

註：n = 388。居住六者：237 人、一般縣市：124 人、離島地區：27 人。

(五) 大學生與新住民對研究變項之認知差異分析

由表 8 之 *t* 檢定可知，大學生與新住民在偏見的認知上並未達顯著差異；但在刻板印象 ($t = 2.65, p < .05$)，社會距離 ($t = 2.36, p < .05$)，及多元文化接受度 ($t = 12.63, p < .001$) 均達顯著差異，且大學生平均分數高於新住民，特別是展現在多元文化接受度之差距上。

上述各項研究發現，本文將於下單元中深入討論。

表 7
刻板印象、偏見、接觸經驗與社會距離對多元文化接受度之階層迴歸分析

自變項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模式 5	模式 6	模式 7	模式 8	VIF value
年齡	.052	.031***	.064*	.044***	.033***	.025***	-.073***	-.004***	1.068
年級	.014	-.029***	-.102*	-.144***	-.134***	-.046***	-.105***	.029***	1.018
家庭收入	.023	-.027***	-.095*	-.157***	-.102***	-.049***	-.126***	.089***	1.005
刻板印象		.337***		.358***	.240***	.206***	.259***	.182***	1.559
偏見		.163***		.138***	.082***	.018***	.087***	.064***	1.426
直接接觸		.182***		.070***	.007***	.013***	.002***	.021***	1.361
間接接觸		.017***		.023***	.017***	.044***	.051***	.012***	1.286
時間(月)		.025***		.054***	.045***	.020***	.046***	.050***	1.334
社會距離					.349***	.267***	.268***	.382***	1.308
<i>F</i>	.556	16.038***	8.090**	17.813***	24.407***	8.646***	17.342***	19.945***	
Adj. <i>R</i> ²	-.002	.221***	.035**	.233***	.326***	.136***	.253***	.281***	

註： $n = 388$ 。依變項：社會距離（模式 1, 2）；多元文化接受度（模式 3, 4, 5 為整體構面；模式 6 為認知、模式 7 為情感、模式 8 為交際子構面）。

*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 8
金大學生與新住民在研究變項上之 *t* 檢定

構面	大學生		新住民		<i>t</i>	<i>F</i>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刻板印象	3.49	.44	3.33	.59	2.65*	1.523*
偏見	3.30	.38	3.22	.51	.173	.290
社會距離	3.68	.68	3.51	.73	2.36*	2.037*
多元文化接受度	4.05	.49	3.44	.45	12.63***	5.283***

* $p < .05$. ** $p < .01$. *** $p < .001$.

綜合討論

(一) 受試者基本資料及研究變項上的發現與討論

首先，針對第一次的研究問卷發現，大學生對新住民刻板印象較為正面。其中，大學生對日韓籍最正面，例如，做事是勤奮的，之後依序為美澳歐、港澳、大陸籍、東南亞。其次，大學生對新住民偏見態度亦較為正面，例如，文化素質高，其中對日韓籍新住民最正面，之後依序為美澳歐、港澳、大陸籍，以及東南亞。此外，大學生對新住民之社會距離不大。其中，大學生對日韓籍社會

距離最小，之後為美澳歐，對東南亞與大陸籍之社會距離較大。另外，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對新住民多元文化接受度是高的，其中認知程度最高，交際能力次之，情感能力再次之。

再者，本研究進行第二次問卷分析後發現，大學生最願意通婚國籍的前兩者為日韓與美澳歐籍，其共同原因為「生活水平較高」。在印象方面，日韓與美澳歐之共同因素為素質高、有能力及有才幹；兩者間差異之因素，在日韓籍為「做事勤奮」，在美澳歐籍為「富裕」。在看法方面，日韓與美澳歐之共同因素為文化涵養高、經濟狀況佳，其差異之因素在日韓籍為「友善的」，在美澳歐籍為「可生出較好的下一代」。另外，在受訪者最不願意通婚的選項中，以東南亞籍與大陸籍的通婚意願最低，其中之生活習性較不同、文化上較不同、生活水平較低之三大原因為受訪者對東南亞國籍最不願意通婚之理由，但在大陸籍方面則完全與之不同，以政治意識、無法為我或家人帶來好處、彼此國家（兩岸、區域）間之關係不佳為三大理由，此為本研究在最不願意通婚原因的兩類國籍中發現差異最大也最特殊之處。在印象方面，東南亞與大陸籍之共同因素為素質低及做事不勤奮；兩者間差異之因素，在東南亞籍為「貧困的」，在大陸籍為「無家庭責任」。在看法方面，東南亞與大陸籍之共同因素為文化涵養低、經濟婚姻；兩者間差異之因素，在東南亞籍為「教育程度低」，在大陸籍為「不友善的」。

上述研究發現，說明了大學生對新住民刻板印象及偏見是較正面的，且社會距離感不高，同時文化接受度也高。但本研究亦發現，大學生在國籍之認知上有很大差異，特別是在認知程度最高的日韓與美澳歐籍，以及最低的東南亞與大陸籍等類別之國籍中，顯示出無論是通婚意願的高低原因或是印象與偏見（或看法）之差異均甚大。從第二次的問卷資料分析來看，生活水準、文化差異及教育水平對受訪者是否願意其或家人與之通婚有高度的影響；而通婚或不通婚之原因更進一步與他們對新住民的印象或看法產生關聯性，如在最有意願通婚之國籍類別中，對他們的印象普遍是素質高的、有能力及有才幹的；對他們的看法亦普遍認為文化涵養高及經濟狀況佳。反之在最不願意通婚的國籍類別中，無論在原因、印象與看法上則剛好相反。但值得我們觀察的是，在第二不願意通婚的大陸籍之原因卻充滿著政治意識與兩岸關係不佳的因素，此對大陸籍新住民是否能融入我們的社會，使臺灣成為多元文化接受度高的地方其影響是深遠的，特別是大陸籍女性是新住民中人數最多的一群。

申言之，雖然本研究與陳志柔與吳家裕（2017）之研究，在方向上或研究的取樣上及時間上皆有差異，但均涉及受訪者對新住民的態度。因此，若將這兩份研究發現放在一起審視，卻呈現一個值得省思的現象，即雖然陳志柔與吳家裕之研究認為，在 2004 年到 2014 年期間，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籍的婚姻移民，接受的比例顯著增加；但在本研究中卻發現他們是受訪者最不願意通婚的對象。基於此，本研究認為這一現象可能呈現三種意涵。其一，雖然 2004 年到 2014 年期間，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籍的婚姻移民接受的比例顯著增了，但此比例可能未必表示大學生大多數是支持此二國籍者的婚姻移民；其二，臺灣民眾接受大陸及東南亞籍的婚姻移民但不等於就希望自己或親友與他們婚配，此一現象特別顯現在受訪之大學生中；其三，本研究調查期間為 2019 年，在此五年間，特別是 2016 年的 5 月後，是否兩岸間的關係有較大之改變而讓本研究的年輕受訪者（大學生）對大陸新住民的接納度明顯下降了？因此，不僅是如陳志柔與吳家裕所稱的「對中國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本省族群和泛綠選民，相對於外省族群和泛藍選民，其間的態度差異仍舊存在（陳志柔、吳家裕，2017，頁 437）。」，如今可能連年輕族群也存在著態度上的差異了。

以上推論，若是第一項，是否說明了臺灣年輕之大學生至少對大陸與東南亞籍新住民仍存在著社會距離，並且對他們的多元文化接納度還是不夠的？若是第二項，是否說明了臺灣的年輕學生對他們還是存在著偏見或歧視？否則為何能夠接受大陸及東南亞籍的婚姻移民但卻不希望自己或親友與他們婚配？若是如此，是否意味臺灣的大學生對大陸與東南亞籍之新住民實際上仍存在著刻板印象，在意識上對他們仍抱持著偏見，以致在態度上展現了歧視而不自知？這可能與「隱性的冒犯」有關，後文將再討論。若是第三項，是否如陳志柔與吳家裕（2017）所稱的，臺灣的族群關係和國族政治所形塑的意識型態，正可以解釋何以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之間，對大陸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一直存在顯著差異。而兩岸關係呈現冰凍的現狀，更是讓大學生不願意與大陸籍人士通婚的主因呢？因此，研究者認為臺灣若欲成為多元文化接受度高的地方，政府應盡量降低國人在兩岸間政治意識上的分歧，但以兩岸關係的現狀來看，這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此外，本研究透過大學生與新住民之認知差異分析，卻發現兩者除偏見外，其餘研究變項之認

知均有顯著差異，且大學生的認知均高於新住民。本研究認為其原因可能與本研究樣本係學生有關。如近來我政府大力推行多元文化教育，新一代年輕學生，對族群認同與包容度均顯得較高；此一推論或可從 Kim (2010) 及 Lee (2015) 等人之研究發現，較年輕族群之大學生對新住民之刻板印象與偏見是較正面的，而社會距離感也較小之研究結果一窺究竟。此或許顯示臺灣的多元文化教育是有成效的，因此臺灣應持續在此方面努力，並對較年長且已在社會就業之民眾，從多面向的管道紮根，如透過社區教育，借重多元媒體功能，及舉辦能增加民眾與新住民互動機會的活動，以彌平雙方關於研究變項的認知差異。再者，本研究發現，對不同國籍新住民之態度有差異，此一研究結果與 Lee (2007) 及 Youn (2011) 之研究發現，人們對不同人種之態度有顯著差異之研究脈絡一致。在多元文化接受度方面，大學生亦顯現出高接受度；本研究認為此亦與臺灣近年來的多元文化教育有關。然而，大多數的臺灣民眾與大陸籍新住民同樣具有華人血統，但受訪者對他們在各研究變項上的認知卻是較低的，究其原因是否與本研究所發現之政治意識及兩岸關係不佳所引起？實質得吾人探討。進一步而言，從本研究發現直接接觸對社會距離，以及對多元文化接受度之交際構面具有正向影響力觀之，如何促進兩岸人民的直接交流機會，應是消除大學生對大陸籍新住民刻板印象或偏見，進而縮小社會距離之最直接且有效方法；特別是在大學生的部分，正可透過兩岸學生交流學習的互動機會，增加彼此間的理解。尤其大陸已經在經濟方面崛起的現狀下，國人或許因未與大陸籍新住民有直接接觸經驗，而仍停留在既往之印象中，再加上目前兩岸政治氛圍緊繃，或許是造成本研究上述發現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同「接觸假說」之論點 (Gaertner et al., 1996)，透過人際接觸可消除彼此之意見、化解分歧，進而拉近社會距離，此為我們可加強之部分。

第二、女性對多元文化接受度之認知情形顯著高於男性，並包含在認知、情感與交際能力等方面。此與 Kim (2010) 及高永晨 (2014) 等人之研究發現一致。此一現象也許可從社會知覺層面來看，如世人較認為女性應具備關懷與同理心，及女性在東方社會的養成教育中被灌以不同的使命感，再加上世俗對女性較具包容心與同情心，且較男性更具柔性人文關懷的知覺，因而促使男女間在多元文化態度上產生差距 (Chen et al., 2017)。另外，文獻亦指出，性別差異在多元文化素養、族群涵化的文化適應或同化過程議題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素質表現 (Gurung & Mehta, 2001)，本研究所顯示的性別差異現象，或可從前述的文獻中獲得一些印證。

第三、本研究結果顯示，日間部學生在多元文化之情感認知度高於進修部。此一研究發現呼應了張海輝 (2004) 及伊慶春與章英華 (2006) 等人認為不同群體的社會距離存在不對稱的研究結果。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或許與日間及進修部受試者在工作經歷上有較大差距有關，因而在生活經歷、教育背景、思維方式以及社會經驗等均有差距下，對多元文化開放性與移情能力的認知有差異。

第四、大學生與新住民除了在偏見認知上並未達到顯著差異外，其餘變項均有顯著差異之研究發現，反映了兩項意涵。首先是，大學生自認其對新住民之刻板印象是較正面的，且社會距離感不高，同時文化接受度也高，但此與新住民之認知有顯著差異。前述現象是否顯示大學生陷於「隱性歧視」而不自知？亦即大學生可能潛藏著一種「隱性冒犯」(microaggressions)，換言之他們的歧視是不露聲色且不自覺的。若我們的推論是正確的，受訪之大學生也許存在著「厭惡種族主義」之意識而不自知。厭惡種族主義是一種潛在的、無意的、消極的種族主義情緒，但持有者卻認為自己是一個講求平等主義和非偏見之人 (Dovidio et al., 2002)。此外，研究亦顯示，某些國家的少數民族經常面對細微的侮辱，雖然這些侮辱是冒犯性的，但往往是無意的 (Boysen, 2012)。

同樣的，本研究發現與陳志柔與吳家裕 (2017) 的研究，在同為高等教育程度者 (大學教育程度以上者) 是相異的。其中，陳志柔與吳家裕的研究，發現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籍女性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高教育程度者相對於低教育程度者，傾向開放的程度在 2004 年至 2014 年間更為擴大。然本研究卻發現，大陸及東南亞籍女性是大學生最不願意通婚的對象。前述兩項研究相較後，吾人看到有趣的現象，亦即，接受婚姻移民不等於願意與他們通婚，雖然兩份研究背景與樣本取向不同，但在類似問項的認知上是大相逕庭的。此一發現是否更能體現「隱性冒犯」存在臺灣民眾之中呢？雖然本研究無法遽下論斷，但兩篇研究相較後所呈現的意涵，卻值得我們再深入探究。

基於此，本研究推論大學生可能在受到較高等之教育並被灌輸多元文化的觀念下，使其認為不可對新住民心存偏見或刻板印象，但卻仍隱藏在其心中，並因此在與新住民有所接觸時，雖不明目張膽的歧視但卻展現在細微處而不自知。後續之研究若能採取對偶問卷，應可有較具體的研究發現。

第二項意涵，前述認知上的差距，或許是新住民對其身處在金門或臺灣的整體感受，果若如此，則環境氛圍有需要被重塑，並且如何建構讓新住民認為金門或臺灣是個愛護與關心他們的友善環境就變得更重要了。

整體而言，本研究在金藝花等人（2018）及高瑞新（2018）之研究發現的基礎上，以更嚴謹之研究方法，再深入地探討大學生對新住民在偏見、刻板印象、社會距離與多元文化接受度之認知上與新住民者間的差異；並利用本次對受訪者的深度訪談及第二次的問卷蒐集機會，以更多元的人口統計變項及分析方法，得知大學生與新住民彼此間的認知差異，並確認其差異原因所在。此一作法讓本研究得到如上述討論中的不少研究發現，並再與其他國人類似之研究相比較後，獲得許多更重要的研究意涵與啟發，此為本研究最大之貢獻。

（二）研究假設發現與討論

首先，本研究假設 1：刻板印象、偏見與接觸經驗對新住民社會距離之認知有顯著影響。研究結果驗證了刻板印象、偏見對社會距離有顯著影響之假設，此與理論上的探討一致。並且，本研究也證實了正向刻板印象和偏見會縮小大學生對新住民之社會距離。此研究發現與 Schneider（2007）、Xue（2017）之研究結果一致。研究結果亦顯示，同一人在刻板印象與偏見的認知上是較一致的，亦即刻板印象會影響情感層面的偏見，而偏見程度越低的人，其負面刻板印象也會越小。然而，本研究在不同接觸經驗方面，僅直接接觸對新住民之社會距離有顯著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接觸經驗對社會距離僅部分獲得支持，亦即只有直接接觸獲得支持，間接接觸則無。此一發現顯示，直接接觸的經驗重於間接，而間接的接觸方式即使接觸時間較久亦作用不大。此一結果或許可從「接觸假說」理論獲得理解，它認為人際接觸是消除偏見，化解分歧進而拉近社會距離的關鍵因素。本研究結果呼應了接觸假說論點，同時也印證了「接觸是否有助於拉近社會距離，與接觸的方式（直接或間接）有關聯」之既有研究（例，伊慶春、章英華，2006；Dovidio et al., 2003）。此外，本研究結果亦顯示了出國旅遊或打工經驗，相較於無經驗的學生，因較直接之跨文化接觸經驗，而在交際能力上有顯著影響力，此一發現更印證了接觸假說論點。

其次，本研究假設 2：刻板印象、偏見與接觸經驗對新住民多元文化接受度之認知有顯著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對新住民之刻板印象與偏見對多元文化接受度有顯著正向影響，但接觸經驗無。本研究發現驗證了大學生刻板印象和偏見越正面時，其社會距離感越小，且大學生對多元文化接受度之整體層面及認知、情感與人際能力之個別因素亦更高。本研究結果呼應了 Chung（2014）及 Youn（2011）等人之研究發現。同時，本研究結果亦反映了大學生在與「我」文化有差異或衝突的文化現象，在風俗與習慣等方面具有正確認知，因此對新住民未展現出負面刻板印象或偏見，也縮小了與新住民間的社會距離，並在此基礎上，接受與適應新住民所帶來的多元文化。

第三，本研究假設 3：社會距離對新住民多元文化接受度之認知有顯著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的社會距離對新住民多元文化接受度有顯著負向影響。本研究發現驗證了大學生對新住民之社會距離感越小時，其對多元文化接受度之整體層面及認知、情感與人際能力之個別因素亦更高。本研究結果呼應了 Park 與 Lee（2013）、Chung（2014）及 Ebner 與 Helbling（2016）之研究發現。同時，本研究發現亦反映了當受訪者願意跟新住民群體互動時，彼此社群間的社會距離就縮小了，並且彼此間將有一種共同身份的感覺（Ebner & Helbling, 2016）。這種相同感覺更拉近他們之間的距離，進而高度的接受文化的多元特性。

（三）研究建議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與討論，本研究建議如下：

首先，基於本研究發現與接觸假說理論，本文認為大學生與民眾應增加與新住民接觸機會，以降低和減少民眾或學生對新住民之不正確或負面刻板印象及偏見。基此，本研究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如教育部，文化部或移民署，除了舉辦針對新住民家人或親子間之相關活動外，也應該重視新住民與民眾間之互動，包含一般之大學生。其次，本研究雖然顯現出大部分受試者對新住民有較正面刻板印象和偏見，但就不同國籍配偶的態度和社會距離感仍有差異，顯示臺灣大學生仍有國別或

地域上的特定認知。由於透過多元文化教育可適時地減少人們對其他族群的偏見（李佩珊、謝百淇，2020），基於此，本研究建議政府機關、學校或團體可適當增加與多元文化相關的教育內容和活動，特別在受試者對東南亞及大陸籍新住民的認知相較其他國籍較低時，應適當地增加東南亞及大陸籍新住民在臺生活較積極正面的案例，如幸福知足的婚姻，和諧的家庭關係，勇於奮鬥的精神，及大陸與東南亞籍新住民對臺灣社會的貢獻等。

其次，鑒於異族接觸經驗一直被視為消弭族群歧視的機制，且一般接觸或實質接觸經驗被證實會減低婚姻帶來的社會距離，故加強民眾跨族群的社會接觸機會，當有助於改善未來臺灣各族群間的關係（伊慶春、章英華，2006）。基此，除了民眾與新住民間的直接接觸外，亦建議政府單位或團體注重媒體影響力，並對一般民眾宣導正確面對新住民之態度，避免以偏蓋全的錯誤認知。

另外，新住民的子女在成長過程中，相較於其外籍父親或母親與臺灣的本籍學生有更多互動的機會，因而新住民子女本身就是縮短本地生與新住民間社會距離感及提升民眾多元文化接受度的最佳催化劑。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單位應透過增加交流、互動的機會，引導新住民家庭之臺灣籍配偶和其家庭成員正確認知新住民之母國及其文化的認識，以提升此一催化劑之功能。除前述之外，本研究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為了促進大學對多元文化之認識，除了在課程安排上應多增加關於族群的歷史與文化之通識或專業課程外，教育單位亦應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以提升教師對新住民文化的認知；同時，亦需強化學校教師對於多元文化的敏感度，並研編各類宣導資料與融入新住民文化議題之教案，以利教育實施，從而奠定尊重多元文化之基礎。

最後，本研究發現大學生與新住民之認知是有差距的，此項差距無論是來自於大學生之「厭惡種族主義」的作祟，抑或是臺灣整體環境給新住民的認知所致。為解決此項差距，我們應與新住民多進行對話，並反思自己該如何面對他們。主要的對話者，可以是學者、教師、學生，當然也包括政府人員、社會工作者和所有可能與新住民有接觸之人群。藉由有質疑也有對話之回應方式，呈現許多可能代表偏見或刻板印象之隱藏語言及細微動作。因而對話的內容，可能呈現在彼此的日常交流或學者之研究成果中，或學生平常上課的課程中。倘若能如此，隨著對話和交流的不斷深化，人們對新住民許多隱藏的刻板印象或偏見問題將會因為越瞭解而越清晰與深刻，如此將有助化解本研究所發現之此項問題。

（四）對未來研究者之建議

首先，本研究對象為國立金門大學學生與金門地區新住民；從本研究中發現，金大學生可能隱含著國際化程度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和偏見。基於此，建議往後之研究可考慮針對臺灣本島之大學生進行抽樣調查，並以國際化程度作為變數之一進行研究。其次，中國大陸籍新住民是目前國內新住民中最多的族群，惟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對他們在各研究變項上的認知卻是較低的，究其原因是否與本研究所發現之政治意識及兩岸關係不佳所引起？實質得吾人探討。基於此，建議往後之研究可考慮將政治意識形態或政治價值作為變項進行研究，以提供更堅實的證據及可行性的建議。最後，本研究將新住民的原屬國籍分類為中國大陸、港澳、日韓、東南亞、美澳歐籍及其他等項，然而美澳歐籍之國家過於廣泛且生活水平彼此間有差距，問卷設計的周延性可能較不充足。基於此，建議往後之問卷設計能考量到區域與生活水平之均衡性，以讓問卷設計能夠更加周延。

參考文獻

內政部移民署（2021年2月23日）：〈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7/?alias=settledow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2021, February 23). *Number of spouses of foreign and mainland Chinese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Macao)*.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7/?alias=settledown>]

- 李佩珊、謝百淇（2020）：〈為弱勢者發聲：高中生之偏見察覺力與旁觀者介入知能課程探究〉。《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8（1），39–73。[Lee, P.-S., & Shein, P.-P. (2020). Speaking up for the disadvantaged: Empowerment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rejudice awareness and bystander intervention behavior.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8(1), 39–73.] [https://doi.org/10.6151/CERQ.202003_28\(1\).0002](https://doi.org/10.6151/CERQ.202003_28(1).0002)
- 伊慶春、章英華（2006）：〈對娶外籍與大陸媳婦的態度：社會接觸的重要性〉。《台灣社會學刊》，12，191–232。[Yi, C.-C., & Chang, Y.-H. (2006). Attitudes toward having a foreign daughter-in-law: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ontact. *Taiwanese Sociology*, 12, 191–232.] <https://doi.org/10.6676/TS.2006.12.191>
- 金藝花、李瑞生、高瑞新（2018）：〈大學生對新住民的社會距離、多元文化接納度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警學叢刊》，48（6），59–86。[Kim, Y.-H., Lee, J.-S., & Kao, R.-H. (2018). A study on the social distance,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to new immigrants—the case of college students. *Police Science Quarterly*, 48(6), 59–86.]
- 吳澤霖（1992）：《美國人對黑人、猶太人和東方人的態度》。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Wu, Z.-L. (1992). *The attitude of Americans to Blacks, Jew, and Oriental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高永晨（2014）：〈中國大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測評系統的理論框架建構〉。《外語界》，4，80–88。[Kao, Y.-C. (2014). Build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valuation system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4, 80–88.]
- 高瑞新（2018，11月17–18日）：〈多元文化接受度影響因素之研究 - 金大學生與金門外籍配偶之認知差距分析〉（口頭發表論文）。2019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金門縣。<https://cabkc.kinmen.gov.tw/shopping?uid=84&pid=94> [Kao, R.-H. (2018, November 17–18). *A study 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of college students—Taking foreign spouses as example and discussing the cognitive ga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nd foreign spouses* (Paper presentation). 2019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n Kinmen Studies, Kinmen. <https://cabkc.kinmen.gov.tw/shopping?uid=84&pid=94>]
- 夏曉鵬（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153–196。[Hsia, H.-C. (2001). The media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ign brides” phenomeno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43, 153–196.] <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0109.0008>
- 陳志柔、吳家裕（2017）：〈臺灣民眾對外籍配偶移民的態度：十年間的變化趨勢（2004–201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9，415–452。[Chen, C.-J., & Wu, K.-U. (2017).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migrants in Taiwan: The ten-year change, 2004–2014.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9, 415–452.]
- 陳孟筵、林以正、張硯評、黃金蘭（2020）：〈親子共讀對新住民孩童心理社會發展困境之緩衝效果〉。《教育心理學報》，52，389–414。[Chen, M.-T., Lin, Y.-C., Chang, Y.-P., & Huang, C.-L. (2020). Buffering effects of parent-child reading on young child development in families with immigrant mother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2, 389–414.] [https://doi.org/10.6251/BEP.202012_52\(2\).0007](https://doi.org/10.6251/BEP.202012_52(2).0007)
- 張海輝（2004）：《不對稱的社會距離—對蘇州市本地人與外地人的關係網絡和社會距離的起步研

- 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北京清華大學。[Chang, H.-H. (2004). *Asymmetric social distance—A starter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locals and foreigners in Suzhou Cit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Tsinghua University].
- 萬文隆（2004）：〈深度訪談在質性研究中的應用〉。《生活科技教育月刊》，37（4），17–23。[Wan, W.-L. (2004). Application of in-depth interview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iving Technology Education*, 37(4), 17–23.]
- 葉肅科（2004）：〈外籍配偶家庭：社會資本與社會凝聚力初探〉。《社區發展季刊》，105，133–149。[Ye, S.-K. (2004). Foreign spouses family: A preliminary study on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ohesi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Quarterly)*, 105, 133–149.]
- 劉家好（2018）：《臺灣社會接受婚姻移民了嗎？～從一位越南配偶的生活史談起》（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Liu, C.-Y. (2018). *The hospitality of Taiwan society to foreign immigrants ~ A narrative story of female marital immigrants from Vietnam*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蔡明璋（2011）：〈從接觸到接受？婚姻移民支持態度的再檢視〉。《研究台灣》，7，1–23。[Tsai, M.-C. (2011). From contact to acceptance? A re-examination of supportive attitudes to marriage migra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7, 1–23.] <https://doi.org/10.6456/JTS.201106.0003>
- 龔宜君（2019）：〈格格不入：來臺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雙重缺場〉。《台灣社會學刊》，65，69–125。[Kung, I.-C. (2019). Out of place: The double absence of Vietnam marriage immigrants. *Taiwanese Sociology*, 65, 69–125.] [https://doi.org/10.6786/TJS.201906_\(65\).0002](https://doi.org/10.6786/TJS.201906_(65).0002)
- Ahn, J.-H. (2007).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 in Korea*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Yonsei University.
- Bagozzi, R. P., & Yi, Y. (1989). On the us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in experimental design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6, 271–284. <https://doi.org/10.2307/3172900>
- Baumgartner, H., & Homburg, C. (1996). Application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marketing and consumer research: A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13, 139–161. [https://doi.org/10.1016/0167-8116\(95\)00038-0](https://doi.org/10.1016/0167-8116(95)00038-0)
- Bogardus, E. S. (1925). Social distance and its origin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9, 216–226.
- Boysen, G. A. (2012). Teacher and student perceptions of microaggressions in college classrooms. *College Teaching*, 60, 122–129. <https://doi.org/10.1080/87567555.2012.654831>
- Burmeister, E., & Aitken, L. M. (2012). Sample size: How many is enough? *Australian Critical Care*, 25, 271–274. <https://doi.org/10.1016/j.aucc.2012.07.002>
- Chen, C.-H. V., & Kao, R.-H. (2012). Work values and servic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The mediation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 case of students in Taiwan police colleg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7, 149–169.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1-9832-7>
- Chen, Y., Lu, J., Wang, Y., Feng, Z., & Yuan, B. (2017). Social distance influences the outcome evaluation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Evidence from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Neuroscience Letters*, 647, 78–84. <https://doi.org/10.1016/j.neulet.2017.03.018>

- Chen, M.-Y., & Gay, G. (2020).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for the children of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Perspectives of new immigrant parents. *Problems of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78, 1065–1080. <https://doi.org/10.33225/pec/20.78.1065>
- Choi, O.-J., Lee, K.-S., Lee, K.-T., & Kim, J.-H. (2017). Influences of stereotype and social distance on prejudice toward African Americans.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Africa*, 27, 13–17. <https://doi.org/10.1080/14330237.2016.1268262>
- Cho, Y.-M., & Sok, S.-H. (2019). The influence of multicultural perception and cultural competence upon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among nursing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the Korea Contents Association*, 19, 190–197. <https://doi.org/10.5392/JKCA.2019.19.10.190>
- Chung, S. W. (2014). *Affecting factors on the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of adolescen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Kongju National University.
- Corrigan, J. D., & Schmidt, L. D. (1983).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revisions in the Counselor Rating Form.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0, 64–75. <https://doi.org/10.1037/0022-0167.30.1.64>
- Coser, L. A. (1971). *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Idea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Crisp, R. J., & Turner, R. N. (2012). The imagined contact hypothesi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125–182.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394281-4.00003-9>
- Damigella, D., & Licciardello, O. (2014).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s at school: A study on primary school reading book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27, 209–213. <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4.03.242>
- Dovidio, J. F., & Gaertner, S. L. (1986).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racism: Historical trends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In J. F. Dovidio & S. L. Gaertner (Eds.),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racism* (pp. 1–34). Academic Press.
- Dovidio, J. F., Gaertner, S. E., Kawakami, K., & Hodson, G. (2002). Why can't we just get along? Interpersonal biases and interracial distrust.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8, 88–102. <https://doi.org/10.1037/1099-9809.8.2.88>
- Dovidio, J. F., Gaertner, S. L., & Kawakami, K. (2003). Intergroup contact: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6, 5–21. <https://doi.org/10.1177/1368430203006001009>
- Dovidio, J. F., Glick, P., & Rudman, L. A. (2005). Introduction: Reflecting on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Fifty years after Allport. In J. F. Dovidio, P. Glick, & L. A. Rudman (Eds.), *On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Fifty years after Allport* (pp. 1–15). Blackwell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02/9780470773963.ch1>
- Ebner, C., & Helbling, M. (2016). Social distance and wage inequalities for immigrants in Switzerland.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0, 436–454. <https://doi.org/10.1177/0950017015594096>
- Evans, G., & Need, A. (2002). Explaining ethnic polarization over attitudes towards minority rights in Eastern Europe: A multilevel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1, 653–680. [https://doi.org/10.1016/S0049-089X\(02\)00018-2](https://doi.org/10.1016/S0049-089X(02)00018-2)
- Friedman, S. L. (2010). Determining 'truth' at the border: Immigration interviews, Chinese marital

- migrants, and Taiwan's sovereignty dilemmas. *Citizenship Studies*, 14, 167–183. <https://doi.org/10.1080/13621021003594817>
- Fusch, P. I., & Ness, L. R. (2015). Are we there yet? Data saturation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Qualitative Report*, 20, 1408–1416. <https://doi.org/10.46743/2160-3715/2015.2281>
- Gaertner, S. L., Rust, M. C., Dovidio, J. F., Bachman, B. A., & Anastasio, P.A. (1996). The contact hypothesis: The role of a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on reducing intergroup bias among majority and minority group members. In J. L. Nye & A. M. Brower (Eds.), *What's social about social cognition? Research on socially shared cognition in small groups* (pp. 230–260). SAGE Publications. <https://doi.org/10.4135/9781483327648.n10>
- Geisinger, K. F. (2010). 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 In I. B. Weiner & W. E. Craighead (Eds.), *Corsini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pp. 1408–1410). John Wiley & Sons. <https://doi.org/10.1002/9780470479216.corpsy0135>
- Goff, P. A., Steele, C. M., & Davies, P. G. (2008). The space between us: Stereotype threat and distance in interracial contex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4, 91–10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4.1.91>
- Gollnick, D. M., & Chinn, P. C. (1994).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Merrill.
- Goldschmidt, T., & Rydgren, J. (2018). *Social distance, immigrant integration, and welfare chauvinism in Sweden*.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 Sozialforschung (WZB)*. <http://hdl.handle.net/10419/178705>
- Gordijn, E. H., Koomen, W., & Stapel, D. A. (2001). Level of prejudice in relation to knowledge of cultural stereotyp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7, 150–157. <https://doi.org/10.1006/jesp.2000.1443>
- Groyecka, A., Witkowska, M., Wróbel, M., Klamut, O., & Skrodzka, M. (2019). Challenge your stereotypes! Human Library and its impact on prejudice in Poland.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9, 311–322. <https://doi.org/10.1002/casp.2402>
- Guyll, M., Madon, S., Prieto, L., & Scherr, K. C. (2010). The potential roles of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stigma consciousness, and stereotype threat in linking Latino/a ethnicity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6, 113–130. <https://doi.org/10.1111/j.1540-4560.2009.01636.x>
- Gurung, R. A., & Mehta, V. (2001). Relating ethnic identity, accultura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 treating minority client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7, 139–151. <https://doi.org/10.1037/1099-9809.7.2.139>
- Hagendoorn, L. (1993). Ethnic categorization and outgroup exclusion: Cultural values and social stereotyp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hierarch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6, 26–51. <https://doi.org/10.1080/01419870.1993.9993771>
- Hagendoorn, L., & Kleinpenning, G. (1991). The contribution of domain-specific stereotypes to ethnic social distan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0, 63–78. <https://doi.org/10.1111/j.2044-8309.1991.tb00923.x>
- Hainmueller, J., & Hiscox, M. J. (2007). Educated preferences: Explaining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in

-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1, 399–442. <https://doi.org/10.1017/S0020818307070142>
- Hebl, M. R., Williams, M. J., Sundermann, J. M., Kell, H. J., & Davies, P. G. (2012). Selectively friending: Racial stereotypicality and social reje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1329–1335.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2.05.019>
- Hwang, J.-M. (2012). The factors affecting ordinary children's sense of social distance from those in multi-cultural family. *Contemporary Society & Multiculture*, 2(1), 174–210. [황지민 (2012) : 〈다문화 가정 아동에 대한 일반 아동들의 사회적 거리감에 영향을 미치는 요인〉. 《현대사회와 다문화》, 2 (1) , 174–210 .]
- Jeong, S.-W., & Jeong, J.-C. (2012). The effect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distance on the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of adolescent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Studies*, 5(1), 51–68. [정석원, 정진철 (2012) : 〈청소년의 다문화 교육경험과 사회적 친밀감이 다문화 수용에 미치는 영향〉. 《다문화교육연구》, 5 (1) , 51–68 .]
- Jeon, Y.-J., & Jun, Y.-H. (2010). Influences of stereotypes and emotions toward women immigrants by marriage on social distances. *Korean Journal of Human Ecology*, 19, 1–13. <https://doi.org/10.5934/KJHE.2010.19.1.001>
- Jones, F. L., & Smith, P. (2001). 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in national identitie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patterns.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45–63. <https://doi.org/10.1177/144078301128756193>
- Jöreskog, K. G., & Sörbom, D. (1988). *PRELIS: A program for multivariate data screening and data summarization – A preprocessor for LISREL*. Scientific Software.
- Kahn, K. B., & Davies, P. G. (2011). Differentially dangerous? Phenotypic racial stereotypicality increases implicit bias among ingroup and outgroup member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4, 569–580. <https://doi.org/10.1177/1368430210374609>
- Kelley, C., & Meyers, J. (1995).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Inventory*. National Computer Systems.
- Kim, M.-J. (2010).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inventory of Korean Childre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Home Economics Graduate School of Korea University, Seoul, Korean.
- Kim, K.-H. (2013). Effects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on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among social work students: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familiarity to foreigners. *Social Welfare and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 22, 77–104.
- Kim, K.-M., & Ahn, S.-S. (2014).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ceptive behavior towards the migrant workers from South East Asia. *The Korean Journal of Woman Psychology*, 19, 315–338. <https://doi.org/10.18205/kpa.2014.19.3.007>
- Kim, T.-Y., Lee, D.-R., & Wong, N. Y. S. (2016). Supervisor humor and employee outcomes: The role of social distance and affective trust in supervisor.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31, 125–139. <https://doi.org/10.1007/s10869-015-9406-9>
- Krejcie, R. V., & Morgan, D. W. (1970). Determining sample size for research activities.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30, 607–610. <https://doi.org/10.1177/001316447003000308>

- Lan, P.-C. (2019). From reproductive assimilation to neoliberal multiculturalism: Framing and regulating immigrant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Taiwan.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40, 318–333. <https://doi.org/10.1080/07256868.2019.1598952>
- Lee, H.-L. (2007). *Study on social prejudice towards race -centering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distance to stereotypes and emo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Hanyang University.
- Lee, S.-Y.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ing students' social distance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mentally disabled individual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Keimyung University.
- Lien, M.-H., Huang, S.-S., & Yang, H.-J. (2021). A pathway to negative acculturation: Marital maladjustment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ngth of residenc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BMC Women's Health*, 21, Article 190. <https://doi.org/10.1186/s12905-021-01334-0>
- Lin, M. S.-H. (2016). Limits of the EU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for migra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Vietnamese migrant community i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the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Sustainable Multilingualism*, 9, 78–101. <https://doi.org/10.7220/2335-2027.9.4>
- Lubis, S., & Buana, R. (2020).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s 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ethnic and Indigenous Moslem in Medan city, North Sumatra Province-Indonesia. *Britain Internatio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IOHS) Journal*, 2, 513–522. <https://doi.org/10.33258/biohs.v2i2.252>
- McKerrell, S. (2015). Social distance and the multimodal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n sectarian song. *Social Semiotics*, 25, 614–632. <https://doi.org/10.1080/10350330.2015.1046216>
- Modood, T. (2017). Must Interculturalists misrepresent multiculturalism?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5, 1–17. <https://doi.org/10.1186/s40878-017-0058-y>
- Munroe, A., & Pearson, C. (2006). The Munroe multicultural attitude scale questionnaire: A new instrument for multicultural studies.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66, 819–834. <https://doi.org/10.1177/0013164405285542>
- Nosek, B. A., Greenwald, A. G., & Banaji, M. R. (2007).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at Age 7: A Methodological and Conceptual Review. In J. A. Bargh (Ed.),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unconscious: The automaticity of higher mental processes* (pp. 265–292). Psychology Press.
- Pagnini, D. L., & Morgan, S. P. (1990). Inter-marriage and social distance among US immigrant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405–432. <https://doi.org/10.1086/229534>
- Park, R.-E. (1950). *Race and culture*. The Free Press.
- Park, Y.-J., & Lee, J.-E. (2013). Factors that have impacts on the multi-culture acceptance of juveniles. *Journal of School Social Work*, 24, 285–310.
- Parrillo, V. N., & Donoghue, C. (2005). Updating the 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tudies: A new national survey.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2, 257–271. <https://doi.org/10.1016/j.soscij.2005.03.011>
- Podsakoff, P. M., & Organ, D. W. (1986). Self-report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2, 531–544. <https://doi.org/10.1177/014920638601200408>
- Powers, D. A., & Ellison, C. G. (1995). Interracial contact and black racial attitudes: The contact hypothesis

- and selectivity bias. *Social Forces*, 74, 205–226. <https://doi.org/10.1093/sf/74.1.205>
- Schneider, S. L. (2007). Anti-immigrant attitudes in Europe: Outgroup size and perceived ethnic threat.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53–67. <https://doi.org/10.1093/esr/jcm034>
- Schumacker, R. E., & Lomax, R. G. (1996). *A beginner's guide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https://doi.org/10.4324/9781410610904>
- Simkus, A. (2016). *The aftermath of war: Experiences and social attitudes in the Western Balkans*. Routledge.
- Stephan, W. G., Ybarra, O., Martnez, C. M., Schwarzwald, J., & Tur-Kaspa, M. (1998). Prejudice toward immigrants to Spain and Israel: An integrated threat theory analysi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9, 559–576. <https://doi.org/10.1177/0022022198294004>
- Stolle, D., & Harell, A. (2013). Social capital and ethno-racial diversity: Learning to trust in an immigrant society. *Political Studies*, 61, 42–66.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48.2012.00969.x>
- Wark, C., & Galliher, J. F. (2007). Emory Bogardu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ocial distance scale.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38, 383–395. <https://doi.org/10.1007/s12108-007-9023-9>
- Xue, C. (2017). A study of social dista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minority social work in Xinjiang.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9, 278–290. <https://doi.org/10.1080/17525098.2017.1254735>
- Youn, I.-S. (2011). *Children's social distance with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childre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Keimyung University.

收稿日期：2021年04月06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1年04月08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1年07月15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1年08月06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1年08月17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1年08月20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2, 54(1), 205–234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 O. C.

Are New Immigrant Women Accepted?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the Kinmen Area

Cheng-Chung Cho Rui-Hsin Kao

Department of Ocean and Border Management,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Taiwan is one of the most preferred destinations for foreign immigrant workers and marriage immigrants. In January 2021, the number of marriage immigrants was 560,617, a number representing 2.38% of Taiwan's population. Of them, 368,237 spouses were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and they accounted for 65.68% of marriage immigrants; this number was followed by that for Vietnamese spouses, who accounted for 19.60% of marriage immigrant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2021). In an earlier era, most marriage immigrants in Taiwan were women, who were referred to as "foreign brides" from underdeveloped Asian countries. Their marriages were often simplistically understood as "mercenary marriages" (Hsia, 2001), reflecting the stereotype and prejudice of some Taiwanese people toward marriage immigrants.

In the patrilineal tradition of Chinese society, having a daughter-in-law had a stronger impact on the family than having a daughter get married. The attitude of parents toward their sons marrying foreign women (including women from mainland China) indicates not only the acceptance level of the families but also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Additionally, newlywed brides are expected to adapt to their new environment (Yi & Chang, 2006).

Some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attitude of Taiwanese people toward marriage immigrant women.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having an accepting toward marriage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between 2004 and 2014 (Chen & Wu, 2017).

According to the aforementioned studies, the acceptance of new immigrant women has increased in Taiwan, mostly because of social contact with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value of said women (Chen & Wu, 2017). A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whether Taiwanese people have prejudices toward or stereotypes of new immigrant women, wheth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status between people have decreased, and whether Taiwanese peopl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ccepting of people from various cultures; the results of these studies have revealed various findings. A study that recruited college students (Kim et al., 2018) reveal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d relatively positive stereotypes toward new immigrant women but their views were linked to the nationality of the immigrants. For example, they had a positive perception of new immigrant residents from Japan and Korea, but their perspective regarding those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mainland China was negative. A study titled "Out of Place: The Double Absence of Vietnam Marriage Immigrants" (Kung, 2019, p.69) reported "linguistic challenges, commercialized marriage as a symbolic violence, and negative transnationalism from the suffering experience of Vietnam women, including lonely, intimate discontents, uncivil attention, and betrayal."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acceptance of marriage immigrants in Taiwan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related factors, and the cognitive gap between new immigrants and

college students. The causes of prejudice, stereotypes, and social dista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people really accept new immigrants.

Hagendoorn and Kleinpenning (1991) proposed that people have different stereotypes toward ethnic minoritie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and these differences affect the social distance from ethnic minorities. They also reported that the stereotypes of people toward certain groups or members were related to prejudice to some extent, regardless of the measuring methods (Damigella & Licciardello, 2014). Choi et al. (2017) suggested the possibility of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stereotypes and social distancing. Moreover, prejudice is notably implicit toward certain ethnic groups that are conceptualized on the basis of several stereotypes—for example, African Americans.

Overall, stereotyping is a basic cognitive attitude that entails beliefs regarding a certain social group and its members, and prejudice is a negative emotional attitude.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are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affect the social distance from ethnic minorities (Xue, 2017). Moreover, a certain stereotype toward certain groups and their members would also involve prejudice (Evans & Need, 2002).

Park and Lee (2013) reported that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include self-respect, social suppor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distance, with social distance having the most notable influence. They found that the lower the social distance is, the higher the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is. Kim and Ahn (2014) demonstrated that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are th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 immigrant workers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Jeong (2014) used social population variables (including gender, grade, cross-cultural friendship), contact experience, and social distance as variables and discovered that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affect social distance, which further influences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Contact experience can include formal (multicultural course in school) or informal (community activity, media, etc.) contact. Kao (2014) reported that people could eliminate certain prejudices and discrimination toward Chinese immigrants and increase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through introspection and discussion, learning to respect and appreciate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e. Kim et al. (2018) inferred that compared with students who did not have any experience abroad, those with such experience possessed mor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Moreover, students with cross-cultural contact experience are less likely to exhibit prejudices or stereotypes or to keep a wary social distance.

This study adopt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obtain research data on college students and new immigrants in Kinmen. Two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he first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sample 400 college students and 269 new immigrants, and the secon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nfirm the factors (reasons, impressions, and prejudices) that influence the willingness (most willing or least willing) of college students to intermarry with individual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This study analyzed various data and teste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rough frequency distribution, Pearson correlation, reliability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In addition, a Likert 5-point scale was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variables. The scale comprised the following five degrees: “Strongly disagree,” “Disagree,” “Neither Agree or Disagree,” “Agree,” and “Strongly agree.” The variable scores represented the respondents’ stereotypes, prejudices, contact experience, perception of social distance, and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For the variables, higher scores corresponded to stronger recognition of the assessment item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overall stereotype toward new immigrants is positive.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of new immigrants is also considerably hig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oreover, the perceptions of most variables notably differed among the students, except for the variable of prejudice. The nationalities that the college students were most willing to intermarry with were Japanese, Korean, American (USA), Australian, and European, with the general reason being “higher living standard.” The students were least willing to marry with Southeast Asian and mainland Chinese individuals. The major reasons for less willingness to marry those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ere the differences in living habits and culture and lower living standard. The key reasons for the unwillingness to intermarry with mainland Chinese individuals wer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ability to bring benefits to the respondent or their family, and poor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Therefor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reasons for the low willingness to intermarry. Overall, the first questionnaire revealed the cognitive attitude of college students toward the research variable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attitude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nd new immigrants; the second questionnaire confirmed the reasons,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s that influence the willingness (most willing or least willing) of college students to marry individual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Kim et al. (2018) and Kao (2018), this study applied more rigorous research method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nd new immigrants due to prejudice, stereotypes, social distance, and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In addi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participants and two questionnaire surveys, multiple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analytic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discern the reasons for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nd new immigrants.

Keywords: new immigrants, multicultural acceptance, social distance, contacting frequency

